

翻譯《等待》——翻譯中「漢語性」的研究

黎韻孜*

摘要：華美文學的出現是近數十年間重要的文學和文化現象，既引起了讀者極大的興趣，也使學術界為之著迷。作為後起之秀，哈金是文學界公認最為成功的華美作家之一。他的第二部小說《等待》（1999年），獲得了當年的美國國家圖書獎，也為他贏得了最為廣泛的讀者群。哈金是十分獨特的華美作家，他以第二語言來書寫他的第一手材料，那是他三十幾歲才開始正式使用的語言。哈金大概慣性的仍以中文來構思，之後在腦中將意念翻譯成英文。這種在書寫過程中的「翻譯」，見諸於書中頗具中國特色的人名、地名、文化專有項、成語和俗語等，構成了一種非常有趣的語言現象，也許更在無意之間構成了一種對西方讀者有強大吸引力的陌生化美感——我將其定義為「漢語性」。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這種「漢語性」的存在，《等待》才得以風行海外並得到批評界的廣泛讚譽。不過這種「漢語性」並沒有為哈金的譯者提供多少便利。在將哈金作品譯回中文的過程中，譯者的工作似乎只是簡單地將哈金本來會以母語寫作的東西呈現出來。然而，為原讀者群而設的那種豐富的陌生化美感，卻在譯本中頗為失色，甚或消失殆盡。因此對於譯者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處理哈金作品中吸引人的陌生化效果。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哈金的英文原本和金亮的中文譯本，探討《等待》的原文/譯文的文本如何在兩種語言和文化中被呈現和解讀。

關鍵字：《等待》、翻譯、「漢語性」、陌生化、哈金

一. 引言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華美文學的出現成為文學和文化的重要現象，既引發了讀者極大的興趣，也使學術界為之著迷。華美文學論爭的核心，是作者如何在作品中呈現中國的文化和語言。華美作家的作品普遍存在雙語、雙文化的現象，造成了一種陌生化的效果。根據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 (Victor Shklovsky) 的說法，陌生化「使對象陌生，使形式變得困難，增加感覺的難度和時間的長度」。¹ 陌生化的一個

* 黎韻孜，休斯頓大學 現代與古典語言系助理教授。

1. Shklovsky, V. "Art as Technique" In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Four Essays*, eds by Lee T., & M. J. Rei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12.

重要方面——語言陌生化，指的是在文本中通過採用打破常規的詞語和句式規範來實現語言的多樣性。哈金的《等待》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書中那些源自漢語的「翻譯」實際上造成了一種陌生化的效果。

因此，本論文的假設是當譯入語——漢語——恰好也是源文本中的外來語時，原本陌生化的表達和結構都很容易被還原。然而，還原後，譯入語文本中的表達或結構適應了譯入語讀者的閱讀習慣，陌生化效果也就不可避免地消滅了。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華美英語文學源文本中的陌生化是否在中文譯本中丟失或大大削弱了，若是，這種消滅是否由於原有的陌生化元素在翻譯中被還原而被造成的。我們是否還能實現「忠實」和「對等」這些翻譯中的金科玉律？我將通過對哈金的《等待》以及金亮的中譯本的研究分析，試圖解答以上問題。

本文將重點分析造成《等待》原文中的陌生化效果的幾個方面，包括中文中特定的文化專有項、成語、諺語，以及人名和地名，來審視這種特殊的陌生化的可譯性，以及譯者金亮如何在譯本中還原原文造成陌生化的那些語言因素：是將其歸化，還是試圖在譯本中再現同樣的陌生感。

二. 「漢語性」的誘惑

正如斯泰西 (R. H. Stacy) 所言，儘管實現陌生化有可能「不需要非常刻意地使用非常規的語言，但是同樣的題材可能會被另一位作家用一種本身就是奇特的、非常規的、充滿典故和隱喻，甚至是神秘的語言來寫就；一種實際上非寫實的語言」。² 這句話的意思是，雖然語言不被視為實現陌生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但若使用得當，也能幫助實現陌生化，它可以從語言的角度把讀者引入陌生化情境，以吸引讀者。

當哈金創作《等待》的時候，他還不能熟練寫作英語。對他來說，用英文寫作充滿了「焦慮感和不確定性」。³ 正因為哈金的英語口語不太靈光，也沒有信心寫好英文，有人甚至質疑他是否能充分理解美國文化。他既然不能對英語應用自如，寫作時便不免依賴母語。他慣性地用漢語來構思創作，然後把意念和詞句再寫成英語，自然而然使他的西方讀者產生一種陌生感。他早期的作品便常常出現歐化的漢語成語和表述，比如「金蓮」、「黑心」和「執法如山」等。這些來自中華文化的語詞成為哈金文本中陌生化的一個重要來源，因為儘管他的故事是用英語講述的，但是其中的文化意象和語法表達對大部份英美讀者來說尤為陌生，所以英美讀者在被引入故事的同時也被疏離了。我將哈金作品中的這種語詞的新鮮感稱為「漢語性」。這裡的「漢語性」，是指由於哈金的母語漢語和他的第二語言英語的交互作用而產生的敘述中的異國情調。這種奇特的和非常規的語言，在哈金的小說中，體現在從漢語字面翻譯過來的特定語彙、成語和俗語，以及人名、地名，這種語言使得他的中國故事更為真切，同時也許在無意識之間構

2. Stacy, R. H. *Defamiliarization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1.

3. Weich, Dave. "Ha Jin Lets It Go." (2005) Retrieved on Nov 10, 2009 <<http://www.powells.com/authors/jin/html>>.

成了一種「陌生化」。

《等待》中的「漢語性」最觸目的特色就是對文化專有項的運用，例如“lotus feet”⁴（三寸金蓮），“horses and mules”⁵（騾馬化），“carry on the family line”⁶（傳宗接代），“green-hatted cuckold”⁷（戴綠帽子的王八），“mandarin ducks”⁸（鴛鴦），“butterfly fairy”⁹（蝴蝶仙子）。這些富有文化內涵的詞語使得這個中國故事更為生動，但對西方的讀者來說又是奇特而陌生的。

除了文化專有項之外，哈金寫作中的「漢語性」還來自於漢語成語和俗語。比如“A good man must never take liberties with his friend’s wife”¹⁰ 是從中文俗語「朋友妻不可欺」¹¹ 翻譯來的。這類的中文熟語大大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給西方讀者造成一種陌生化的衝擊力。這種衝擊力與維克多·埃利希（Victor Erlich）所說的「多樣性的品質」有關，即在語言層面上「與當前的語言用法的偏離」。¹² 由於漢語成語與英語表述方式不同，西方讀者不免感到新奇，並著迷於異國情調。

除了以上提到的特徵，《等待》語言上的其它一些方面也值得仔細考量，比如稱謂和地名就很有特色。「同志」在中國是用來稱呼朋友或者同事的，那時的中國人通常以姓名加「同志」的方式稱呼對方，尤其是那些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或者在黨政機關工作的人。當曼娜和林孔在部隊醫院工作的時候，他們被稱為「吳曼娜同志」和「孔林同志」。在命名地名時，哈金也是試圖加入中國元素，尤其是與那個特定的歷史背景相關的元素。街道、工廠甚至雜貨鋪的名稱要麼帶有共產主義政治寓意，比如“Splendor Match Plant”¹³（光輝火柴廠），“Sunrise House”¹⁴（朝陽飯館），“Glory Cigarette”¹⁵（光榮牌香煙），“Peace Avenue”¹⁶（和平大街）和“Glory Street”¹⁷（光榮街），要麼是傳統中寓意吉祥的名稱，比如“Peony Cigarette”¹⁸（牡丹菸捲），“Flying Pigeon”¹⁹

4. Ha Jin. *Waiting*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9), p. 206.

5. *Ibid.* p. 37.

6. *Ibid.* p. 95.

7. *Ibid.* p. 196.

8. *Ibid.* p. 115.

9. *Ibid.* p. 141.

10. *Ibid.* p. 179.

11. 語出《西遊記》第六十回：「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你既欺我妻，又滅我妾，多大無禮？上來吃我一棍！」參考溫端政（1989，頁615）。

12. Erlich, Victor.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Doctrine* (4th ed.) (The Hague: Mouton, 1980), p. 252.

13. Ha Jin, p. 218.

14. *Ibid.* p. 13.

15. *Ibid.* p. 9.

16. *Ibid.* p. 215.

17. *Ibid.* p. 215.

18. *Ibid.* p. 59.

19. *Ibid.* p. 100.

（飛鴿牌），“Little Golden Deer”²⁰（小金鹿）等。還有人物的姓名也都有文化上的深層寓意，這點將在下文中細談。當西方讀者看到這些中國名字的時候，自然而然地會產生一種陌生而又新鮮的感覺。

以上可以看出，《等待》中的語言代表著一種介乎居於統治地位的、標準的英語和中文之間的混合話語，從而削弱了霸權語言，在引入中文的過程中重塑了自我的聲音。正是這種霸權語言和民族語言之間的交互作用，構成了哈金作品的「漢語性」。有些人認為「漢語性」是華美文學的普遍特徵。比如胡勇發現：

華裔作家都喜以漢字形象或直譯或意譯英譯後置於文中……這種假借語言符號竟然成了新一代華裔文學的一個共同特徵。²¹

胡勇正確地指出了華美作家自覺或不自覺地在作品中插入中國元素，但是他沒有指出不同的華美文學作品之間的區別。為了闡明這一點，並說明《等待》中呈現的陌生化究竟起了何等效用，我們有必要對哈金和其他的華美作家進行一番比較。細察不同華美作家的作品。經過觀察，我們可以發現他們之間頗有差異。哈金小說中的「漢語性」更為明顯和自然，而第二代華美作家的作品中的「漢語性」通常是更為刻意地插入的。例如，作者譚恩美（Amy Tan）在《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中插入了一些中國特定的文化專有項，而這些寫成斜體拼音的詞數量眾多，比如“*shou*”²²（壽）和“*chunwang chihan*”²³（唇亡齒寒）。有些詞譚恩美還會加以詮釋，例如，「*chaswei*（叉燒），甜的、被切成玉米粒大小的烤肉」²⁴和「*kechi*（客氣），彬彬有禮」²⁵。足見斜體之出現並非偶然。與之類似，趙建秀（Frank Chin）的《唐老亞》也包含了一些附帶說明的、以斜體標識的廣東話，比如“*sifu*”²⁶（師傅）、“*lay see*”²⁷（利是）、“*deem sum*”²⁸（點心）。任璧蓮（Gish Jen）在《典型的美國人》中也大量插入了斜體中文，但會在上下文中加以解釋，以免產生讀者的誤解。斜體的拼音或者廣東話的插入顯示作家的一種有意嘗試而非慣常的手法。譚恩美和趙健秀的作品中的「漢語性」憑藉的是漢語詞彙的音譯，而這種情況在哈金的作品中十分罕見，因為除了人名和地名外，他並不使用音譯。由於大量地採用自然的漢語表達——很有可能是作者自己的意譯或創造——哈金的作品令其讀者耳目一新，與眾不同。

20. Ibid. p. 155.

21. 胡勇：《文化的鄉愁：美國華裔文學的文化認同》（北京：中國戲劇，2003），頁149-151。

22. Tan, Amy. *The Joy Luck Club*. (New York: Putnam's, 1989), p. 48.

23. Ibid. p. 163.

24. Ibid. p. 31.

25. Ibid. p. 250.

26. Chin, Frank. *Donald Duk: A Novel* (2nd ed.) (Minneapolis: Coffee House Press, 1997), p. 11.

27. Ibid. p. 33.

28. Ibid. p. 92.

《等待》中的「漢語性」既然清楚可見，我們便進一步來考量它的可譯性。由於文本中的陌生化效果主要是通過哈金特殊的語言手段實現的，翻譯似乎難以保持這種效果。因為在將文本轉換回中文的時候，「漢語性」的效果自然會大打折扣。所以，譯者在尋求實現哈金原作的等值效用的時候如何處理這些微妙之處就有必要深入的來探究。下文通過挑選出來的英語原文中的例子和它們相應的中文翻譯的對比，探討本譯本如何呼應哈金作品中的「漢語性」。

三. 翻譯「漢語性」

要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在翻譯研究中關於「陌生化」的理論和批評。愛爾蘭詩人西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在《翻譯的影響》一文中寫道：

翻譯在過去數十年來所做的工作不僅向我們介紹了新的文學傳統，而且引導我們把這種新的文學經驗與一種記錄勇氣和犧牲、並博得我們衷心讚美的現代殉教史聯繫起來。²⁹

此處，希尼指出「新的文學經驗」是翻譯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將目的語的表達世界變得陌生。換句話來說，翻譯可以看作是將原文的「差異性」充分顯示出來的一種詮釋方法。翻譯理論家根茨勒（Edwin Gentzler）認為：「譯文應該保留源語文本的陌生化表現手法，如果源語文本中的表現手法在第二語言中已經存在，譯者就要構想出新的表現手法。」³⁰ 顯然他認為翻譯中應該保留語言的多樣性和創造性。這一論述說明譯者應該保留或用再創造的手法以求譯作跟源語文本產生同等的陌生化美感。基於這些論點，譯者應該盡可能保留原文的「陌生化」，把原作中的差異性傳達出來。實際上如何處理原文的「差異性」也是翻譯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

但是，《等待》特殊的「漢語性」把譯者置於一個特別的位置。上文提到，《等待》的「漢語性」主要是由哈金在寫作時用中文構思造成的。對《等待》的中譯者而言，似乎只需要把英文小說還原成哈金本來用母語構思的中文小說。可這樣一來，原文讀者所感受到的陌生化美感就會自然地消滅甚至消退。可見譯者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處理原文的陌生化效果。

把《等待》譯成中文似乎像重構一部中文的「原作」。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譯者的隱形》一書中提出了「譯者的隱形」，以保留原作的審美趣味，指出譯作應該：

讓人覺得它反映了外國作家的個性與意圖或外語文本的基本意義——換句話說，

29. Heaney, Seamus. *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 The 1986 T.S. Eliot Memorial Lectures and Other Critical Writings* (London: Faber, 1988), p.38.

30.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80.

就是讓人覺得譯文實際上不是譯文，而是「原作」。³¹

這種效果其實是一種「透明」的錯覺，它「掩蓋了生成譯文的種種因素，首先便是掩蓋了譯者對外語文本的關鍵性干預。」³² 對《等待》的譯者而言，要做到這種「透明」的效果似乎輕而易舉，只需要把原文中陌生化的元素還原到中文就可以了。如此一來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就好像是哈金用母語寫成的一本中文小說。但是，如果原文中所有的陌生化元素都被還原的話，譯本必然會失去陌生化美感。因此，接下來我將通過考察《等待》原文中的「漢語性」，對比原文和譯文各自產生的傳意效果，看看譯者能否產生與原文一樣的陌生化美感。我將以下的例子分成三個類別，然後詳加論述。

（一）文化專有項的還原

艾克西拉（Javier Franco Aixelá）給文化專有項下的定義如下：

在文本中出現的某些項目，由於在目標讀者的文化系統中不存在對應項目或者與該項目有不同的文本地位，因此其在源文中的功能和含義轉移到譯文時發生翻譯困難。³³

由於《等待》裏有大量的文化專有項，研究這些專有項以及它們對應的翻譯可以使我們初步瞭解這一文本特有的「漢語性」的翻譯。

1. The orders said, “We must carry on the spirit of the Long March and restore the tradition of horses and mules.”³⁴

軍區的命令說：「我們要發揚長征精神，恢復騾馬化的光榮傳統。」³⁵

在此例中，「長征精神」和「騾馬化」都是有特定歷史內涵的政治術語。前者指的是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長征中體現的中華民族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³⁶ 後者是人民解放軍在50年代中期的一次重整，也是軍隊歷史上的一次重大跨越，林彪在文革時期大力推崇這個軍事方略。它被認為是保證革命和建設事業走向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金亮在譯文中加了「光榮」二字，更強調了這種光榮傳統。但是西方讀者卻未必理解這些。首先「馬」會引發他們其他聯想，例如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中的公馬 **Boxer** 代表的是俄國工人階級，他們努力為蘇維埃共和國奮鬥，希望可

31.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1.

32. Ibid. pp. 1-2.

33. Aixelá, Javier Franco.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eds. by Román Alvarez and M. Carmen Africa Vidal.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p. 58.

34. Ha Jin, p. 37.

35. 金亮（譯）：《等待》（原作者：Ha Jin）（臺北：時報文化，2000），頁41。

36. 參見「江澤民：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96年10月22日）。新華網。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6-07/25/content_4876667.htm

以實現烏托邦。其次，「騾」在英文中喻指有著跟驢相似或者相關特徵的人，特指愚蠢、固執或者身體強壯的人。³⁷ 因此原文中“horses and mules”會被理解成是愚蠢、沒教養的工人階級，這與哈金本想表達的意思相差甚遠。由此可見，中譯本的讀者會比原文讀者理解得更接近哈金的本意，但同時卻少了一種陌生的意味。

2. They all had celestial creatures embroidered on them — either a dragon with a fireball in its mouth or a phoenix embracing a huge pearl. ³⁸

被面上繡滿了龍鳳呈祥的圖案，或是龍吐火球，或是鳳戲明珠。³⁹

「龍」和「鳳」在中國文化裏是吉祥的象徵，⁴⁰ 因此曼娜在準備婚禮的時候也買了繡滿龍鳳圖案的被子。由於「龍」一詞在中西不同文化中的背景和象徵意義相差甚遠，因此十分難譯。在中國文化中「龍」是一種神奇、高貴而吉祥的動物，但在西方文化中它是神話中的怪物，帶有邪惡、殘酷、野蠻的意味。⁴¹ 例如，在英國長篇史詩《貝奧武甫》中，龍是基督教中邪惡的象徵，被視為「上忤天威、下逆人獸的大惡魔」⁴²。因此「吉祥」的蘊義在譯文中比在英文原文容易理解。再則，英文的句子只把圖案描繪成“celestial creatures”（天上的生物），這個概括性的描述並不特指龍鳳；而譯文中的「龍鳳呈祥」明確點出了「龍鳳」，與後面照應。再加上結構平行、文字對應的兩個詞「龍吐火球」和「鳳戲明珠」，譯文成功地傳達出這種「吉祥」的意味。

3. “The order of the world is rooted in every family,” as Confucius said.⁴³

「聖人說，家和萬事興嘛。」⁴⁴

這句俗語來自清代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⁴⁵。在《等待》中一村民用此來批評林孔和淑玉的離婚一事。中國傳統以家庭和睦為維持人類社會各種關係的基礎，這裡指的是夫妻關係和順，其他一切事情才能興旺，這也符合儒家的人倫家庭觀。比起「家和萬事興」的對應英譯“if the family lives in harmony and affairs will prosper”⁴⁶，哈金的句子缺了「夫妻和諧」的含義。金亮在譯文中填補了這個缺省。

37. Soanes, C., & Stevenson, A.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153.

38. Ha Jin, p. 100.

39. 金亮譯：《等待》，頁113。

40. 關於「龍」和「鳳」的意思，詳見《辭海》（2000，頁2004和頁416）。兩字均出現在《禮記·禮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41. 在西方文化，「龍」原本指的是一種巨蛇。根據《創世紀》記載，有一條蛇引誘夏娃吃禁果，之後《啟示錄》兩次提到龍就是那條毒蛇，叫撒旦。

42. Rauer, Christine. *Beowulf and the Dragon: Parallels and Analogues*. (Cambridge: D.S. Brewer, 2000), p. 52.

43. Ha Jin, p. 123.

44. 同注39，頁141。

45. 參見吳趸人（1998，頁378）。

46. 參見張學英（1998，頁356）。也可以譯成“If there is peace in the home, everything will prosper.”

4. The grass gathered the essence of heaven and earth, yin and yang...⁴⁷

野草的形象是矛盾對立統一的產物：它集合了天地之精華、陰陽間的正氣……⁴⁸

此語來自孔林寫的關於《草葉集》的報告，報告的結尾總結道：「野草是充滿無產階級唯物主義精神的、具有進步意義的象徵。」⁴⁹ 由於草的生命力旺盛，可以在各種土壤生長，所以常常被看作是生死的統一體，歌頌了生命的無限和富足，同時也反映了生命的矛盾和本質。由此一來中國學者通常把草與陰陽相聯繫。在譯文中，金亮用「野草」——很可能來自文革時期為官方推崇的魯迅的同名散文集的意象——而非「草」來強調自主創造和自我界定。這跟孔林加入此句來強調「無產階級唯物主義精神」、強調進步意義的目的是一致的。這句話同時顯示了「草」的對立統一的意象。文中指明這一對立統一來自中國傳統的陰陽二分說，陰陽一說早在《易經》就有所提及。「陰」和「陽」在之後論及曼娜生病一幕有所提及。正如文中的“nourish her yin”（補補身體裡的元氣）⁵⁰「陰」通常指女性的虛弱和溫柔，與此對應的「陽」通常指男性的強壯和韌性。英文原文中此詞出現在“generate too much yang in her body”補勁太大會上火。⁵¹

這些文化專有項之所以令原文讀者感到陌生，是因為原文作者和讀者之間難以建立存在於無形的文化語境基礎之上的默契，這種基於文化共通的缺省被定義為「文化缺省」。⁵² 因此，如果沒有附加解釋，西方讀者無法理解哈金原文中的文化或者政治蘊義，而恰恰是這種模糊造成了陌生化效果。在中文譯本中，金亮還原了這些文化專有項，雖然把原文的意思準確傳達出來了，卻丟失了原文產生的陌生化效果。

（二）漢語諺語的還原

1. “...You know there’s no wall without a crack...”⁵³

「……你知道，沒有不透風的牆……」⁵⁴

「裂縫 (crack)」指的是「夾在兩個斷裂或者分開的表面之間的細長的縫隙」。⁵⁵ 雖然文中孔林說的這句話也許令西方讀者感到迷惑，但他們可以從下文「咱們今天整這事兒，別人早晚會知道。」猜出此句的意思。譯者沒有把此句直譯成「沒有裂縫的牆」，而是還原成中文常用的俗語「沒有不透風的牆」，意指事情最終總會被發現，準確傳達了作者的原意。

47. Ha Jin, p. 154.

48. 同注39，頁176。

49. Ha Jin, p. 154.

50. 同注39，頁174。

51. 同注39，頁178。

52. 王東風：〈文化缺省與翻譯中的連貫構建〉，《外國語》第6期（1997），頁55。

53. Ha Jin, p. 68.

54. 同注39，頁77。

55. Soanes, C., & Stevenson, p. 401.

2. He had best cut the entangled knot once and for all. ⁵⁶

他必須要快刀斬亂麻。⁵⁷

英文中“tie yourself (up) in knots”意指「在做決定或者解決問題的時候感到非常困惑或者憂慮」。因此可以推測“cut the knot”意思與此相反，即指能夠解決一個複雜的問題。原文讀者也可以從前一句話猜出此句之義，前一句是「他們不能在這種惡毒的陰影中生活一輩子」。這兩句都表明了孔林想脫離三角戀的迫切心情。漢語習語「快刀斬亂麻」比喻「做事果斷，能採取堅決有效的措施，很快解決複雜的問題」。這個翻譯忠實反映了原作者要表達的意思。

3. A well-fed man can never feel a beggar's hunger pangs. ⁵⁸

飽漢不知餓漢饑。⁵⁹

原文恰是漢語諺語「飽漢不知餓漢饑」的翻譯，意思是處境好的人對別人窘迫的處境不表同情。這個諺語在中國文學中使用廣泛。例如，著名劇作家老舍在《殘雪》的第三幕中寫道「劉媽，敢情你們好，一天到晚吃喝玩樂！人家把家都丟了，你們還這麼高興呢，真是飽漢不知餓漢饑！」在《等待》一書中，當孔林聽說魏副政委要見曼娜時，他立即想起這句諺語「飽漢不知餓漢饑」。政委憑著自己的官職和權勢任選自己喜歡的女人，而孔林卻只能擁有一個女人。這句諺語形象地描繪了社會階層分化，官員就像是「飽漢」，而下屬以及平民百姓就像是「餓漢」。其實在西方文化中也有一些對應的諺語，比如：“He whose belly is full believes not him that is fasting”，“Little knoweth the fat sow what the lean doth mean”，“The fat man knoweth not what the lean thinketh”，“Who hath dined well believes not who is fasting.”⁶⁰ 對照而言，哈金所寫的那句更凸顯了社會階層的分化，而金亮把它還原成耳熟能詳的諺語。

4. “You landed two birds with a single bullet.” ⁶¹

「你們這叫一槍打兩鳥。」⁶²

在文中，到孔林家的訪客用這句話來表達欣羨之情。在他們眼中孔林很幸運，因為他有一個大女兒，現在又跟曼娜生了兩個兒子。哈金沒有用英文中常見的俗語“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箭雙雕，意謂同時達到兩個目的），而用了“land two birds with a single bullet”。此例是典型的「陌生化」，因為它跟常用語不同，給作品帶來了一種陌

56. Ha Jin, p. 107.

57. 同注39，頁121。

58. Ha Jin, p. 138.

59. 同注39，頁158。

60. 張學英主編：《漢英習語大詞典》（武漢：湖北教育，1991），頁22。

61. Ha Jin, p. 215.

62. 同注39，頁324。

生化美感。譯者也沒有把它還原成出自《北史》的成語「一箭雙雕」⁶³，而幾乎把原文直譯成「一槍（子彈）打倆鳥。」這樣一來金亮保留了原文的陌生化效果。

5. “With money you can hire the devil to grind grain and cook dinner for you.”⁶⁴
有錢能使鬼推磨嘛。⁶⁵

在英文中同義的俗語有“A golden key opens every door”，“Money makes the mare millstone for you”，“Money talks”，“Money will do anything”⁶⁶，而哈金的描述比起這些更為生動。原句似乎是從中文諺語「有錢能使鬼推磨」直譯過去的。其中“grind grain”（推磨）和“cook dinner”（做飯）可以看作是陌生化元素。金亮的翻譯將其譯回中文俗語，但是丟失了「做飯」這個詼諧有趣的意項。

6. hitting a dog with a meatball—nothing will come back.⁶⁷
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⁶⁸

從形式結構來看，這是漢語中的一句歇後語，由兩部份組成，前一部份「肉包子打狗」是隱喻，後一部份「一去不回」是解釋。哈金把這句歇後語完整翻譯了出來，但也有細微的改變。例如，他沒有把「肉包子」譯成“meat bun”，而是譯成“meatball”，因為在西方國家後者比前者較為常見。可見哈金寫作時還是照顧了西方讀者的。他引進了漢語元素，但又不完全照譯，所以是一種混雜語，而這種混雜語也帶出了陌生化效果。然而在金亮的翻譯中這種混雜語得到了還原，原文中的模糊也隨之消失了。

由此可見，漢語諺語的使用使原文達到了陌生化的效果。除了以上幾例，還有：“A fresh rose is planted on a cowpat”，⁶⁹「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⁷⁰，比喻一個如花似玉的美女嫁給很糟糕的男人⁷¹；以及“At thirty she is like a wolf; at forty a tiger”⁷²，「三十如狼四十如虎」⁷³，形容三四十歲的女人有很強的性慾。

作為《等待》中「漢語性」的體現，以上的例子說明哈金從漢語中借用了大量的熟語，這些熟語使西方讀者感到陌生，這種效果是以英語為母語的作家難以做到的。作者很有技巧地在文中加入了暗示，使讀者可以從上下文推敲這些熟語的意思。同時，這些

63. 參見《北史·卷二二·長孫道生傳》。

64. Ha Jin, p. 172.

65. 同注39，頁198。

66. 溫端政主編：《中國俗語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1989），頁996。

67. Ha Jin, p. 174.

68. 金亮，頁159。詳細解釋見溫端政，1989，頁996。

69. Ha Jin, p. 186.

70. 同注39，頁214。

71. 溫端政：《中國俗語大辭典》，頁1038。

72. Ha Jin, p. 248.

73. 同注39，頁289。

熟語使小說人物更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對於譯者而言，把這些熟語還原似乎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原文的陌生化也隨之消滅了。除了個別例子如「一槍（子彈）打倆鳥」精心譯出帶有陌生感的中文表達外，大部分的都被還原成了中文讀者耳熟能詳的諺語。

（三）中文名的還原

在中國文化中，名字不僅是區分個人的「標誌」，還寄託了父母對孩子的期望。因而以中文構思的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名字也多被賦予與主題相關的特殊含義。在《等待》一書中，大部份人名以拼音的形式出現，是從中文音譯而來，帶有特別的文化內涵。

男主人公的名字「孔林」首先會讓人聯想到孔子，儒家的創始人。儒家思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在中國思想中佔據統治地位，影響深遠。儒家特別強調家庭責任和孝順，而《等待》中的孔林就是這樣一個孝子。他遵父母之命娶淑玉為妻，處處循規蹈矩，不敢離棄妻子和女兒。他的言行緊遵儒家傳統的家庭觀。另一方面值得關注的是，「孔林」也許與「批林批孔運動」⁷⁴有關。孔林的「等待」悲劇不僅意在引發讀者對儒家教條的反思，也是對文革的一種諷刺。「孔林」此名可謂與人物的性格相當匹配。

另外，文中兩個女主人公的名字「曼娜」和「淑玉」也分別表達了她們的個性。「曼娜」⁷⁵這個名字在文革時候極為罕見，它帶有一種異國風味。這跟她在文中的性格相當吻合。她自信、獨立、勇敢，跟孔林的法定妻子淑玉形成鮮明的對照。「淑玉」中的「淑」⁷⁶字代表了賢良，「玉」代表貞潔，這些都是中國傳統婦女的美德。中國讀者在看到這些名字時很容易聯想到這些內涵。

書中其他人物的名字例如楊庚、海燕、孔仁等都與他們在小說中的性格特徵相當吻合。這些從中文音譯過來的名字打破了西方讀者的習慣性思維，讓他們從中接觸到更多中國文化元素。然而，西方大眾讀者讀到這些名字時並不能聯想到背後的文化，而產生一種陌生疏離感。相反，中譯本的讀者可以輕易聯想到名字背後的文化蘊義，也因此能夠更好地理解書中的人物悲劇。

四. 結 論

由於西方的大眾讀者對儒家、中國軍隊和中國傳統文化缺乏瞭解，所以《等待》中的漢語詞彙和習語背後的文化都給他們造成一種陌生化的美感。本文所舉的例子充分證實了《等待》原文的「漢語性」。書中這種特殊的「漢語性」對西方讀者來說是很大的挑戰，這種「陌生化」也是《等待》的一大特色。很顯然，當金亮將源語文本中的漢語

74. 「批林批孔」是江青發動的一場政治鬥爭，發生在1973-1974年。其中「林」指林彪，「孔」指孔子，這場運動旨在攻擊當時的總理周恩來。

75. 曼娜 (Manna) 一名暗指《聖經》中的 manna，特指上帝賜予的一種精神食糧。參見 "manna." (Soanes.C & Stevenson.A, p.1068)。

76. 「淑」在四書五經裡常指美麗和溫柔。例如《詩經》裡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詳見《辭海》(2000, 頁1148)）此詞也有善良之意，例如《爾雅釋詁》和朱熹的《詩集傳》（卷一）。

習語和文化專有項還原後，得出的譯文必然多少失去了原有的「陌生化」。

總體來說，金亮翻譯的《等待》讀來如非翻譯作品般流暢自然。他主要運用「歸化」的翻譯策略來達到奈達所說的「通順易懂的表達」，這種效果是奈達提出的翻譯中「動態對等」這一原則所要取得的，即在譯語中用最切近而自然的語言引起譯文讀者的文化共鳴。⁷⁷ 這樣的翻譯把原文中異域化的元素歸化成中文裏約定俗成的表達，使譯文讀來通順易懂，漢語讀者也更容易聯想詞彙背後深層的文化含義。有趣的是，當原文中的漢語文化專有項、習語和諺語都被還原了之後，中文譯本便更像是一本沒被翻譯過的原著似的。實際上這可以看作是一個「雙重翻譯」的代表作。原文中由於哈金「字面翻譯」造成的陌生化效果在譯文中被「歸化」以及「熟悉化」所取代。正籍於此，《等待》一書的中譯本在中文世界中比其他外國文學作品或是華美作品的中譯更讓人感到親切。

從本文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華美作品的翻譯研究還有很大的潛力。文本探討的是譯者如何處理華美作品中所包含的中國文學詞彙和語境，如何保留原文的陌生化。譯者難以回譯華美作品中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的現象，也一定存在於別的文學的翻譯現象中，因此還有很多相關議題可以進一步研究。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華美文學的發展，這個課題逐漸向邊緣走向中心，筆者希望翻譯研究學界會對這一課題慎重待之。 □

77. Nida, Eugene.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Brill, 1964), p. 159.